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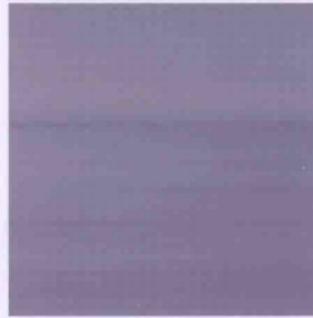


# 谁，在我呼喊时

20世纪的见证文学

[法] 克洛德·穆沙 著 李金佳 译

姜丹丹 何乏笔 主编



Claude Mouchard

*Qui si je criais...?*

Oeuvres-témoignages dans les tourmentes du XX<sup>e</sup> siècl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姜丹丹 何

# 谁，在我呼喊时

20世纪的见证文学

[法] 克洛德·穆沙 著 李金佳 译

Claude Mouchard

*Qui si je criais...?*

Oeuvres-témoignages dans les tourmentes du XX<sup>e</sup> siècl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在我呼喊时:20世纪的见证文学/(法)穆沙著;李金佳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3

ISBN 978-7-5675-2842-0

I. ①谁… II. ①穆… ②李… III. ①文学研究—法国—现代  
IV. ①I565.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5686 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轻与重文丛

## 谁,在我呼喊时 : 20世纪的见证文学

主 编 姜丹丹 何乏笔  
著 者 (法)克洛德·穆沙  
译 者 李金佳  
责任编辑 高建红  
封面设计 姚 荣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6.5  
字 数 85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2842-0/I · 1294  
定 价 3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 主 编 的 话

1

时下距京师同文馆设立推动西学东渐之兴起已有  
一百五十载。百余年来，尤其是近三十年，西学移译林  
林总总，汗牛充栋，累积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从西方  
寻找出路的理想，以至当下中国人提出问题、关注问题、  
思考问题的进路和理路深受各种各样的西学所规定，而  
由此引发的新问题也往往被归咎于西方的影响。处在  
21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新情境里，如何在译介西学时  
作出新的选择，又如何以新的思想姿态回应，成为我们

1

必须重新思考的一个严峻问题。

2

自晚清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一直面临着现代性的冲击所带来的种种尖锐的提问：传统是否构成现代化进程的障碍？在中西古今的碰撞与磨合中，重构中华文化的身分与主体性如何得以实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中西、古今”的对立倾向能否彻底扭转？在历经沧桑之后，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如何重新激发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中，当代西方文明形态的理想模式一再经历祛魅，西方对中国的意义已然发生结构性的改变。但问题是：以何种态度应答这一改变？

中华文化的复兴，召唤对新时代所提出的精神挑战的深刻自觉，与此同时，也需要在更广阔、更细致的层面上展开文化的互动，在更深入、更充盈的跨文化思考中重建经典，既包括对古典的历史文化资源的梳理与考索，也包含对已成为古典的“现代经典”的体认与奠定。

面对种种历史危机与社会转型，欧洲学人选择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解读欧洲的经典，既谦卑地尊重历史文化的真理内涵，又有抱负地重新连结文明的精神巨链，从当代问题出发，进行批判性重建。这种重新出发和叩问的勇气，值得借鉴。

3

一只螃蟹，一只蝴蝶，铸型了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一枚金币图案，象征一个明君应具备的双重品质，演绎了奥古斯都的座右铭：“FESTINA LENTE”（慢慢地，快进）。我们化用为“轻与重”文丛的图标，旨在传递这种悠远的隐喻：轻与重，或曰：快与慢。

轻，则快，隐喻思想灵动自由；重，则慢，象征诗意图栖息大地。蝴蝶之轻灵，宛如对思想芬芳的追逐，朝圣“空气的神灵”；螃蟹之沉稳，恰似对文化土壤的立足，依托“土地的重量”。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那里，这种悖论演绎出一种智慧：审慎的精神与平衡的探求。思想的表达和传

播，快者，易乱；慢者，易坠。故既要审慎，又求平衡。在此，可这样领会：该快时当快，坚守一种持续不断的开拓与创造；该慢时宜慢，保有一份不可或缺的耐心沉潜与深耕。用不逃避重负的态度面向传统耕耘与劳作，期待思想的轻盈转化与超越。

#### 4

“轻与重”文丛，特别注重选择在欧洲（德法尤甚）与主流思想形态相平行的一种称作 *essai*（随笔）的文本。*Essai* 的词源有“平衡”（*exagium*）的涵义，也与考量、检验（*examen*）的精细联结在一起，且隐含“尝试”的意味。

这种文本孕育出的思想表达形态，承袭了从蒙田、帕斯卡尔到卢梭、尼采的传统，在 20 世纪，经过从本雅明到阿多诺，从柏格森到萨特、罗兰·巴特、福柯等诸位思想大师的传承，发展为一种富有活力的知性实践，形成一种求索和传达真理的风格。*Essai*，远不只是一种书写的风格，也成为一种思考与存在的方式。既体现思

#### 4

索个体的主体性与节奏，又承载历史文化的积淀与转化，融思辨与感触、考证与诠释为一炉。

选择这样的文本，意在不渲染一种思潮、不言说一套学说或理论，而是传达西方学人如何在错综复杂的问题场域提问和解析，进而透彻理解西方学人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自觉，对自身文明既自信又质疑、既肯定又批判的根本所在，而这恰恰是汉语学界还需要深思的。

提供这样的思想文化资源，旨在分享西方学者深入认知与解读欧洲经典的各种方式与问题意识，引领中国读者进一步思索传统与现代、古典文化与当代处境的复杂关系，进而为汉语学界重返中国经典研究、回应西方的经典重建做好更坚实的准备，为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创造可能性的条件。

是为序。

姜丹丹、何乏笔 (Fabian Heubel)

2012年7月

# 目 录

**译序 / 1**

**他们无法统治空间**

——读罗伯尔·昂代姆的《在人类之列》 / 14

**空中的坟墓**

——读曼德尔施塔姆、策兰和凯尔泰斯 / 44

**我的良心是一只歪扭的鞋**

——亚沃罗姆·苏兹科维尔在纽伦堡 / 73

**在黑夜的边上**

——读沙拉莫夫 / 86

**杀人的一刻**

——读大冈升平的《俘虏记》 / 106

**他靠给予存活**

——作为见证者的扬尼斯·里索斯 / 120

**撕开世界的平乏**

——关于于坚的未定笔记 / 137

**诗与痕迹**

——第一届西南联大文学节上的演讲 / 156

**附录一 冻僵的人(长诗《证件》节选) / 169**

**附录二 如果这就是生活? / 179**

## 译 序

克洛德·穆沙(Claude Mouchard)的《谁，在我呼喊时?》是一本研究见证文学的文学批评集。在近二十年来法国学者对于见证文学的研究中，这本书堪称力作。对“见证文学”这种提法，国内读者还不十分熟悉。借此译序之机，我对这个文学体裁先略作说明，以便读者能更好地理解这本书的论述对象，以及它的情感氛围。

见证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自传文学。它指的是那些亲身遭受过浩劫性历史事件的人，作为幸存者，以自己的经历为内核，写出的日记、回忆录、报告文学、自传体小说、诗歌等作品。若对见证文学的形成做一历史考察，可以上溯到经常被历史学家们认为是第一场现代战争的美国南北战争，而通过一己之经历，记述并反思这场战争之惨绝人寰的作品，比如惠特曼

的《内战备忘录》(1863—1865)，就经常被认为是见证文学的源头。然而严格意义上的见证文学，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才真正发展起来的，因为从这一次战争起，极端形式的暴力开始同现代国家机器紧密勾结，在某一相当长的时期里，作为一种统治的纲常、一种或显或隐的“善”而存在。它依托于庞大复杂的官僚制度、高唱美丽的意识形态话语、或先进或原始的杀戮技术，有组织、大规模地消灭某一类型或某些类型的人。而界定或制造这些类型，既是国家权力的一个核心齿轮，也是它的一种氛围性的象征能力。

在一战中还是作为倾向而存在的这种制度化暴力，随着一战后各种现代类型的极权制度的建立，得到空前发展，而其所指的主要对象，也由一个外在于“我们”并因这种外在而构成威胁的“他们”，变成那个在“我们”之中以其存在本身败坏“我们”的“你们”。或者说，由外敌变成败类。杀戮哲学这种由“敌对”——敌对尚含有某种平等观念——到“清除”的转变，使国家的、体制性的犯罪，在组织形态上由“战”转为“治”，而其直接涉及的人数也就随之陡然加大数倍。灭绝是极权制度的大同之治：这在二战时期——二战中的太平时期——的纳粹集中营里，得到最精粹的体现。这一可怕的“治世”的余波，直到今天还在世界某些角落此起彼伏，并且随着资本主义全力推进的人的非人化进程，随时可能狂澜一样重新涌起。

由国家罪恶而导致的历史浩劫，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此频繁发生，以至于它可以被看作奠基性、定义性的当代人的经验，成为贯穿于形形色色之“我”的一种集体人格。与此相应，书写这种历史浩劫的见证文学，在 20 世纪后半期也就发达一时，硕果累累。这不幸又一次印证了卢梭关于世丧乱而杰作出的说法。

见证文学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一本“浩劫录”，都可以用“我的浩劫”作为副标题。它的产生有两个必要因素：一是浩劫的发生，构成见证的对象；一是经历浩劫的人，构成见证者。这个见证者，不仅遭受了浩劫带来的苦难和戕害，还要有相当大的承受力，能够从苦难和戕害中活过来，在浩劫之后书写浩劫；相当执着的记忆与思考的欲望，不是用忘怀痛苦来追求新生，而是毒蛇恶鬼一样纠缠于往事；相当成熟的写作技巧，能把被自己内化的浩劫诉诸笔端，使其变成一种存活于作品的文学经验。一言以蔽之，作为见证文学之见证者的我，必须足够我，才能在一场以消灭我为目的的浩劫中真正在场，才能在浩劫后出于也许无谓的坚贞，当着鲁镇中听故事的人，把那一种过往的在场讲述出来。而这一足够我的要求，大概是他们人生中最沉重的负担，甚至比浩劫本身所强加的肉体苦楚，还难以承受。也正是足够我的这个先决条件，可以使我们理解：灭绝性的浩劫曾在许多空间、时间里发生，而见证文学作为一

种文学体裁，却是在现代的欧洲格外发达。

见证文学的作者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都是作为普通人——护士、医生、士兵、下级军官、难民、劳改犯、基层政治活动分子、名不见经传的犹太人——出于一个几乎是命运的偶然经历了浩劫，又出于另一个几乎是命运的偶然，侥幸死里逃生。因此，见证文学又可以称为“幸存者”或“余生者”的文学。它之见证，固然追求以一种尽量平实、客观的角度，讲出一个身经的事实，以供别人或后人对浩劫做出合理的判断。然而它作为幸存者的话语，更是、首先是一声叫喊，喊出一句“我还活着！我要说话，你听着！”它的真实，归根结底总是一个人的真实。围绕一个渺小的“我”在一场群体性灭绝中的疑惑、挣扎、丧失和重新获得，这种真实建立起来。而惟其个别，它也就格外人性、脆弱。它靠近情感而不是靠近权威，依靠人对人、人对语言的基本信赖而不是依靠证据，在它最具批判性和控诉性的段落，它也构不成一种政治话语，不具备审判的功能。见证文学不是英雄的文学，也没有拨乱反正的力量，无法提供一种是非代替另一种是非，因为是非在作者身经的浩劫中变得可疑。这一特点，将两类作品排除于见证文学的范畴之外：一是对浩劫或对浩劫的语录拥有相当主导权力的人——也就是那些站在话筒前说是说非的人，比如各个阵营的政治领袖、精神导师——所写的有关浩劫的自传作品，即使

它是真诚的；一是不曾经历浩劫的人，从某一从无倾覆之虞的是非出发，凭借自己的阅读或想象，或者根据一段电视报道，稳坐书斋写出的以浩劫为题材的小说或诗歌，即使它是严肃的。见证文学是身经浩劫的普通一“我”的文学，“身”与“普通”同是它不可或缺的限定，而倾覆感和零余感是它据以成为真实的情感基础。

20世纪所发生的浩劫，要而言之有三种形式：世界大战，种族灭绝，集中营或死亡劳动营。而与此对应，我们也可以粗略地把见证文学分为三个门类：“战争惨祸”文学，“种族灭绝”文学，“营”文学。这三个门类之间，当然没有截然区分的界限。比如，通称为“受厄”(Shoah)的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戮，聚结着三种形式的浩劫：它发生在二战中，是一场种族灭绝，主要场域为集中营。因而，见证“受厄”的文学作品，也就同时属于上面提到的三个门类。实际上，它们在整个见证文学中地位如此独特，数量如此众多，以至于我们可以将其单列为一类，称之为“受厄文学”。

受厄文学有世界声望的代表性作家，在德语方面有写《骨灰罐里的沙》(1948)和《罂粟与记忆》(1952)的保罗·策兰，写《以利》(1951)和《火迷》(1966)的内莉·萨克斯；法语有写《夜》(1958)的埃利·维瑟尔；匈牙利语有写《无命运的人生》(1975)的凯尔泰斯·伊姆雷；捷克语有写《与一颗星同生》

(1949)的伊日·韦伊(Jiří Weil);波兰语有写《别了! 玛丽亚》(1947)的塔德乌什·博洛沃斯基(Tadeusz Borowski);意第绪语有写《维尔纽斯隔离区》(1945)的亚沃罗姆·苏兹科维尔(Avrom Sutzkever)和写《生命之树》(1972)的哈娃·罗森法博(Chava Rosenfarb)。在这短短一个名单中,已有内莉·萨克斯、凯尔泰斯·伊姆雷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而埃利·维瑟尔也主要是因其写作而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确,在见证文学中,“受厄文学”是杰作最多、成就最大、最受世人瞩目的一个门类,欧洲知识界谈到见证文学,首先想到的总是它。

至于受厄文学之外的其他三个门类,在“战争惨祸”——我的这种提法当然借自戈雅著名的版画——文学中,见证一战、至今仍被视为经典的作品,法国方面有莫里斯·热内瓦(Maurice Genevoix)的《14年的人》(1949结集定稿),德国方面有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的《铁的暴雨》(1921)。见证二战的作品,以日本一国为例,最著名的作品有大冈升平的《俘虏记》(1949)和《野火》(1951),以及峰三吉的《原爆诗集》(1951),分别以太平洋战争中普通一兵的视角和广岛原子弹受害者的眼光,描述战争的荒谬和残毒。

在“种族灭绝”一类见证文学中,继“受厄”之后最重要的书写对象,是1994在卢旺达发生的图西族屠杀事件,在这方面正在形成一个作者群,其中最知名的是尤兰德·马卡伽萨